



□ 马明高

文明古久的山西,有很多文明古久的县市,孝义市便是其中之一。人们都知道它是山西省唯一的全国百强县市,但不知道它已有数千年的“孝义”故事,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中华“孝”“义”文化。

孝义的最早置县,是在晋献公时代。晋在献公时(公元前676—前651)开始强盛,整肃同姓公子,重用异性卿大夫,同时扩军强国,先后消灭了翟、魏、耿、虢、虞等国,疆域日广,为晋国长久争霸中原奠定了稳固的基础。在晋献公消灭虢、虞两国后,与孝义有关的事情发生了。

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载:“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。师返,馆于虞,遂袭虞,灭之。”这场战争创造了中国文化中最经典的两个成语:假途伐虢和唇亡齿寒。按照先秦前的国野制度,统治者对被征服者的处置办法有三种:“一是迁移其国,保留其共同体,置于野中;二



孝义市城东有一个村子,叫大孝堡,原名永安堡。这儿,是大唐贞观年间大孝子郑兴的故里。

光绪十八年《山西通志·孝义县考》中说:“贞观元年省高唐、新城入温泉,以永安县名与涪州同名改为孝义隶汾州,因县人郑兴有孝义故名。”明嘉靖三十二年张冕所著《孝义县志》中记载:“唐贞观元年(公元627年),因邑人郑兴孝行闻于朝,太宗李世民敕改县名为孝义县”。《唐孝义郑兴考略》记载的更为详细,“孝子郑兴,隋人也。祖居汾州永安县永安堡。幼有志性,终日力勤稼穡,奉养高堂,家境较为贫寒。父卒,兴数日水浆不入口,三载守墓。母久病不愈,足服侍床前,衣不解带,足不失履。母想吃肉丸汤,兴割股为羹。事传天下,人皆感动。汾州令房玄龄闻之曰:割股奉亲,乃世之奇事!至此,民间始有‘郑兴奉亲’之说。

唐太宗李世民继位,改纪元为贞观,是为太宗,房玄龄作内相。一日,君臣议事,谈及汾州永安县与四川涪州永安县同名,宜改其一。有奇闻轶事,可供参照?房玄龄便讲郑兴割股奉亲之事与太宗,太宗听得动



是翦灭破坏宗族组织,使之成为臣妾,分赐贵族;三是基本保持对等或臣属关系的原状。”在春秋前后,以第一种即保留被征服者原先的社会组织置于野内,实行集体奴役,是国野制形成的主渠道。于是有了很多史书上记载的“晋灭虞、虢二国,迁其人于此,置瓜衍县”(《汾州府志》语)。

“瓜衍县”,就是孝义市最早的最原始的县名。《春秋传说汇纂》中说:“瓜衍县即山西省孝义县北十里瓜虢城。”《山西历史地名通检》中也说:“瓜衍县,春秋期晋置,故地在今孝义县北十里虢城村。”据老人们说,古虢城有四门,东为映旭门,西为凤仪门,南为鸿文门,北为北极门,周边还有夯土城墙,原鸿文门城楼上供奉周文王神位。

容,脱口而言:此人有孝有义,可为大孝也!房相听此言极妙,立即传旨,御赐更郑兴故里为‘大孝堡’,易邑县为‘孝义’。遂改邑之胜水为‘孝河’,邑之义虢河为‘义河’。并在《祭孝子郑公文》中写道:“惟神至诚格天,纯孝达帝,花封赐名,实田公赐。南北两河,流孝流义……”郑兴虽为隋人,然名出于唐,故世人称之为‘唐孝义’。后于堡四门嵌石‘唐孝义郑兴故里’。”

孔子说:“孝悌也者,其为仁之本也”。孔学即仁学,仁学即儒学,可见,孝是儒学文化的初始与源泉。中华传统文化则是以儒学文化为主的一种文化,而儒学思想是一种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伦理哲学。所以,中华传统伦理学就认为,孝是人之道德的原点,仁、忠、恕、信、义等都是“孝”的延伸和扩充。所以,《孝经·圣治章》中才说:“天地之性中,贵之人之行莫大于孝”。所以,《文昌孝经》中才说:“孝治一身,一身斯立;孝治一家,一家斯顺;孝治一国,一国斯仁;孝治天下,天下斯升;孝事天地,天地斯成。”



孝义最早有文字记载的“义”的故事,比“孝”的故事还久远,也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国。

晋献公之后,晋国又经历了晋惠公、晋怀公、晋文公、晋襄公、晋灵公、晋成公六位君主,后至晋景公执政的第三年,即公元前597年,晋国和郑国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。这年春天,楚国进攻地处河南的郑国,郑国向晋国求援,晋景公任用荀林父、随会和赵朔带兵出战。进军到达黄河岸边时,听说郑国与楚国已经讲和了。那么,是否还要继续进军?中军主帅荀林父主张撤军,想等楚军撤走后再去讨伐郑国。而中军副将先穀坚决反对,并自己率兵渡过了黄河。掌管军政事务的司马厥知道情况后,急忙回报荀林父说:先穀带兵过河,要是打了败仗,您作为主帅的罪过可就大了,不如我们也进军过河。荀林父觉得有理,也率军过了黄河。这时,楚庄王已知晋军

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由“孝”延伸扩充出“忠”、“义”来,同时,社会上也自然演绎出了“忠孝”精神和“忠义”精神。其实,“忠”、“义”是中国传统道德同一基质的两种评价标准。在庙堂之高,基本的道德尺度是“忠”,而在江湖之远,它的基本道德尺度是“义”。所以,“忠”是主流的,而“义”则是民间的。“忠”,表达的是“垂直”的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的等级制的统治者的道德,而“义”表达的,则是“平行”的、“平等”的、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的民间道德。

随着历史的推进深度,“流孝流义”的孝义大地上,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“忠孝”之士和“忠义”之人。

唐武德二年(619年),唐军与叛兵刘武周、宋金刚激战晋地,遭伏兵出击,唐军大败。当时,唐在晋州之北,除太原、汾州(今汾阳市)外,大部分地区陷入刘武周之手。这时候,尉迟恭在宋金刚部下任一员大将,在永安县屯兵白壁关。武德三年,李世民带兵昼夜行军二百里,直追至介休、灵石交界处的崔鼠谷,与刘武周、宋金刚激战数日,宋金刚大败而逃。尉迟恭整理残兵败将继续死守介休、永安两城。李世民行知尉迟恭领兵镇守白壁关,且神勇无比,便派城王李道宗、宗文士前往晓谕。一向耿直的尉迟恭同意归顺唐朝,并献上介休、永安两座城池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尉迟恭大降唐”。李世民得知尉迟恭归降大喜,立刻封他为右一府统军,继续率旧将作战。各路将士见李世民如此信赖尉迟恭而不满。不久,李世民与王世充军激战,遭单雄信长矛策马之险,尉迟恭赶来援助,神勇应战,救驾李世民,歼敌千余人。李世民对尉迟恭更加信赖。武德九年,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为了谋害李世民,想收买尉迟恭。他拒绝说:“敬德起自幽微,逢遇隋亡,天下土崩,甯身无所,久沦逆地,罪不容诛,实落秦王惠以生命,今又隶名秦王藩邸,唯当以身报恩。于殿下无功,不敢谬当重赐。若私许殿下,便是二心,循利忘忠,殿下亦何使用?”后来,李世民登基后,为表彰尉迟恭,特封他为吴国公。唐高祖李渊称他“有安社稷之功”。

尉迟恭死后,他大义降唐的明智之举,以及一生护李卫国,执行唐贞观之治的品行,受到孝义人民的拥戴和敬仰,特在他生活过的东尉屯村筑建“尉迟恭庙”,以示纪念。

明万历年间,时任兵部尚书的孝义籍人霍冀,为处理老家院墙与邻居中盖房地基争执一事,给家里寄了一首诗:“千里捎书为堵墙,再让三尺又何妨?万里长城今犹在,何以不见秦始皇。”接到这首从千里寄来



过河,突然命令进军晋兵,晋军被打得大败。回到晋国,荀林父认为自己对仗败负有罪责,请晋景公将他处死。

这时候,站出一个人来,他就是一起率军出战的上军统帅随会。随会,当时在晋国当大夫,又称士贞子,尊称士伯。他说:三十多年前,文公率军与楚军在城濮会战,以强胜弱,但面带愁容。随从问他,为何有了高兴事反而忧愁呢?文公答道:只要是楚国的相国成得臣还活着,我就高兴不起来。后来,成得臣被楚王杀了,晋文公才高兴地说,这下没有人来害我了,可以说这是晋国的又一胜利,楚国的又一



的诗,两家各让地基三尺,形成六尺街巷,取名“仁义巷”,至今仍存。

石像山人冯济川是孝义市兑镇镇石像村人,一生以兴学为己任,认为“欲振兴庶务,非人才众多不可;欲培养人才,非教育得法不可。”清光绪三十年(1904年)东渡日本,就读日本明治大学经纬学堂,研究东西各国学说。他发现日本的近代工业很发达,与煤炭开采有密切的关系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,山西当局在清政府的支持下,却把全省的采矿业卖给了英国的福公司。冯济川和祁县的渠本翘等人得知情况后,迅速从日本回国,联合山西票号业公司,经农工商部批准,由山西绅商组建山西保晋矿务公司。但英国福公司认为他们百万巨款难以在短期支付,仍想霸占矿权。在紧急情况下,冯济川火速进京,谒见山西巡抚,获授全权,携山西教育总会集团同仁7人,前往平、太、祁票号借款百余万,按期向英国福公司交了百万赎款。福公司在平定等地的厂房、机器等一切财产均归保晋公司。这就是山西近代史上著名的废约赎矿保矿运动。从此,山西出现了第一个初具规模的煤矿开采公司。这个公司就是现在阳泉、大同、潞安、西山几个大矿务局的前身。

孝义市下栅人杨德龄,也是一个“忠义”之人。他童年失母,少年丧父,14岁到汾州义泉涌酒坊学徒,工作努力,颇得师傅密传。三年期满当领班。21岁提升为三掌柜。因连年灾荒,加之有人栽赃陷害,义泉涌彻底倒闭。清光绪八年(1881年),他创办宝泉溢酒坊,做大做强后更名为义泉泳酒坊。民国四年(1915年),他所生产的“老白汾”在北京农商部展览会上以色、香、味三绝获全国二等奖。同年,选送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甲等大奖。自此,老白汾酒誉驰全国,名震四海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日本侵入山西,杨德龄毅然辞总经理职并归故里,临别前主持召开了公司董事会,决议:“国之名酒,不能为外敌饮用”、“只可南销,不可北运”、“万不得已时停工关厂”。民国38年夏天,日军专去下栅请先生“出山”,老人鹤发白须,硬是卧炕闭目不语。日本鬼子气急败坏,竟去抓先生的垂胸美髯,被杨老夫人一掌推倒在地。日本鬼子挥手打了杨老先生一个耳光,恼羞成怒,扬长而去。从此,先生大义凛然,动员五个儿孙投身抗战,并且带头募捐财物支援抗战。1945年暮春,安祥闭目,溘然辞世,享年八十六岁。

1938年,日寇入侵孝义,鸡犬不宁,儿

失败。士贞子接着对晋景公说,今日晋军的失败,是上天在警告我们,要是再杀掉荀林父,这不是为楚国帮忙,让他们胜上加胜吗?何况荀林父也是竭诚尽忠,怎么可以杀呢?

士贞子的仗义执言,使得晋景公赦免了荀林父,恢复了原职。过了四年,到了公元前594年,荀林父挂帅带兵消灭了潞国(今晋东南一带),为晋国开辟了大片疆土。晋景公论功行赏,除赏给荀林父狄臣一千户外,还意外地给了士贞子奖赏。晋景公说:“我能得到狄国的土地,也有你的功劳,如果没有你的劝谏,哪有今日的胜利!”所以,才有了《左传·宣公十六年》的记载,“赏士伯瓜衍县”。晋景公赏给士伯子的,就是现在孝义、汾阳一带的大片土地。

据《左传》记载,瓜衍县南临“随”(介休南,士贞子原封地),西南至“蒲”(蒲县)、“屈”(交口、石楼一带),东北邻“平陵”、“中都”、“郛”(平遥,交城一带),北接狐氏地。即瓜衍河上游上区、中游丘陵及今汾、孝及文峪河流域的大片,都属于“瓜衍之县”。所以《孝义县志》中说:“孝义县春秋为瓜衍县地。”

士贞子仗义执言的人格精神,正是中华民族一直崇尚的儒家文化的精髓: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由此可言,“瓜衍之赏”,既是中国士大夫忠贞、信义的象征,也是孝义这块古老的土地上“行孝仗义”内涵之“仗义”的最早、最原始的表现。

童失学流浪。大孝堡乡长兴村人侯佑诚捐资义学,抵制奴化教育,反抗“日化”,大兴“国学”,办起私立尊德中学,多次被日寇和阎伪政府关押囚禁,仍不改耿耿忠义。学校经费短缺,先生们办纺织厂、炸油漏粉,耕田种地,到解放后移交政府时,尊德中学前后毕业生逾五百余人,多为党政部门主要骨干。直到晚年,侯佑诚已95岁高龄,还带领15位离退休老人孜孜办起“五爱学校”、“百岁入党”、“百岁老人办学”的故事闻名海内外。

还是抗日战争时期,孝义县兑九峪镇有一个村叫石像村,全村仅有一百二十户人家,但从1937年至1938年大约一年多的时间,在八路军、同盟会的宣传发动下,全村就有一百零八人参加了抗战,或在民主政府工作,或在村搞支前工作,或参加了“牺盟会”、八路军,被世人称之为“一百零八义士”。在这“一百零八义士”中,最为突出的是皮影老艺人冯廷云,相继送四个儿子即冯进文、冯进武、冯进川和冯进山参了军。还有冯举人冯济川老先生的孙女冯全英,是孝义县得第一个抗日妇女,出生入死,深入敌后,出任孝义县第一任妇联主任,与抗战时期中共孝义县委书记记梁占祥结为革命伴侣,但因长年艰苦工作,积劳成疾,英年早逝,以身殉职,荣获抗日战区“模范妇女干部”称号。还有曾在日本留学,回国后任山西省督学的冯芝惠,日军占领兑九峪后,多方威逼他担任翻译,他装病不干。但被释放回家的当夜,就参加了抗日政府工作。冯俨字敬卿,把独生子冯松送去参加了八路军,自己仍以商人的身份在兑九峪从事抗日活动,利用亲友关系,把一批批货物运往晋西北,支援抗日革命根据地,后被闫匪军杀害。数不胜数,在这一百零八人中,既有少童,也有老者,既有著名的文人艺人,也有英勇的武者勇士,他们都携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里的那个“义”字,再一次彰显了孝义人民“仗义行孝”的伟大精神,使这样一个古老的村庄永放光芒。

孝义以知行孝仗义而得名,所以,做孝义人、行孝义事、传孝义名,历朝历代都如甘霖春雨深植人心。

在孝义既有“锯树留邻”的“贤者村”,也有因拾物而等失主出名的“居义村”和“留义村”,还有因明朝义虎救樵夫,人虎和谐的民间传说,在旧城西关村留下了“义虎厅”的古迹。

在孝义,既有20世纪80年代,农妇马牡丹大义凛然、舍子救人的故事,也有20世纪90年代的孝义籍军人苏宁舍己救人、光荣牺牲的事迹。

在孝义人的眼里,孝就是人性,义就是天理,孝和义永远是中华民族做人的德行和操守。

孝衍春秋,义贯乾坤。